



作家有责任抒写 中华民族新史诗

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和要求，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

今天我们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不仅要努力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勇攀高峰，而且要有雄心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凝结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

□ 李云雷

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所谓“中华民族新史诗”，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史诗”，这里的史诗不是指特定体裁，而是指包容了巨大历史内容而又具有诗性的作品；二是“民族史诗”，是指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美学的史诗性作品；三是“中华民族史诗”，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情感、记忆的民族史诗，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从《史记》到《红楼梦》，再到鲁迅的小说，都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四是“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指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创造的新的历史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可以从整体上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看到中国，看到我们自己。

中华民族新史诗何以匮乏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可以称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作品相对匮乏。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倾向相关。一是忽视中国经验，注重“西方理论”。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模仿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我们并不反对借鉴西方文学，但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为了表达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而不是以西方的标准规范中国文学。但是在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代派的形式与技巧，以及抽象的对“人性”“死亡”“欲望”等问题的探讨，很少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与内心世界。作品中即使写到中国人，也并不要像生活中的中国人，而是按照某种理论抽象出来的符号，因而失去了生动性与鲜活。二是消解“宏大叙事”，热衷“个人故事”。创作者越来越关注“自我”及其“日常生活”，缺乏宽广的历史眼光与社会意识。这也有一个

演变的过程，在新时期之初，作为对此前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一种反拨，强调“自我”与“日常生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描写“自我”或“日常生活”才是好的文学，而关注他人、关注世界、关注社会议题，便不会有好作品，这就陷入了偏颇与谬误。所谓“宏大叙事”的消解，作为理论探讨有其脉络与价值，但实际上这一命题消解的只是特定的“宏大叙事”，也让作为主体的人更加碎片化，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反思。现在不少创作者囿于“自我”“小叙事”的藩篱，极大限制了个人视野的拓展与艺术才华的发挥，这一点在青年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少有青年作家可以驾驭宏大的题材，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他们的气象、格局与境界偏于狭小，这也是青年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谈论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并不是要抹煞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而是要从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一个更加开阔的境界。艺术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要从创作者最熟悉的生活着手，从其艺术敏感点切入，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更加丰富饱满，更有艺术的生命力，否则便容易陷入空洞或干瘪，甚或走向另一种公式化，这自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就需要将个人体验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并不断拓展生活范围，提高艺术眼光与思想能力。

如何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要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需要具备新的历史眼光、社会意识和世界视野。

所谓新的历史眼光，是指将生活重新“相对化”的反思眼光与能力，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从来如此的，也不是必然如此的。没有历史感，就没有现实感，我们只有在历史脉络的细致把握中，才能够更深刻地感知和把握到“现实”。在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当代中国，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激流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时代的深刻变化也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以通讯方式为例，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我们跨过了电话、呼机、手机时代，现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再以火车交通为例，我们也跨过了绿皮车、快车、特快、动车时代，现在进入了高铁时代。类似这样的变化所在多有，深刻地改变

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这是新的“中国故事”，是此前的中国史上所没有的，我们置身于这一伟大变革之中，只有具备历史的眼光，才能深刻认识其价值。

所谓新的社会意识，是指创作者要突破“自我”的藩篱，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只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一员，个人的生存经验或许并不能够代表其他阶层、群体或个人，而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家走出“自我”，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尤其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与内心。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是更广泛、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底层民众也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创作者只有参与到他们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刻画出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才能创作出为他们所接受喜爱的优秀作品。

所谓新的世界视野，是指我们需要重建面对世界的心态，重构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2008年奥运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了，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在以“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面对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我们的整个知识、思想系统及其问题意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西方文化，而且需要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知识系统，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中，重新构造我们的思维与感觉结构，对此我们显然还缺乏知识与心理准备。而对于文学来说，只有具备这样的眼光与视野，我们才能讲好新的中国故事。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浮士德》，还是《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今天我们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不仅要努力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勇攀高峰，而且要有雄心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凝结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当代中国作家所应有的抱负。

文艺评论

在中央党校南院，有一湖好看的水。水边杂花生树，湖中群鱼戏游，绕湖闲步，颇有一番野趣。更让人欢喜的是，湖面上还有几只天鹅，或黑或白，徜徉水面，引颈嬉戏，如同二色棋子，大珠小珠落玉盘，吸引不少行人驻足欣赏。据说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栖身于此，并非人工饲养。闻听此言，更觉快意。

这种黑天鹅估计不是中夏之物，我国古籍里天鹅被称为“鹄”，见诸记载的，大概有白、黄、红三种颜色。

汉乐府里有白天鹅，比如“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白鹄行》）。两只白天鹅结伴而飞，其中一只忽患疾病，无法相随，另一只辗转哀鸣，不忍离去，二者是夫妻，或是母子，抑或兄弟、朋友？不得而知。古人目睹此情此景，泪落如雨，歌以咏言。古人重别离，生离往往是死别。目送天空飞过的白色天鹅，望断天涯路，天鹅的纯洁、真挚与坚守，也成为古人情感的寄托。“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楚辞里的天鹅是黄色的，“黄鹄之一举兮，如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楚辞·惜誓》）。天鹅一飞而起，遍览山河走势，飞向更高远处，甚至可以看到天地方圆。这种身着黄衣的天鹅，则寄托了古人对远方、对自由的向往之情。鲁班亲手造了一只木鸢，飞了三天三夜都没有落下来；陈胜把锄头丢弃道旁，被众人讥笑，感叹“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史书记载这些事，皆是此意。东汉之后道教盛行，道士流行穿黄衣，“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韩愈《华山女》）。黄鹄随之增添了“仙气”，成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鸟类。唐人崔颢的名篇《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

千载空悠悠”，其实黄鹤应为黄鹄，《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此处即是黄鹄楼所在地，民间传说有仙人乘坐黄天鹅路过。世间当然没有所谓仙人，这个传说只是寄托了古人试图超越肉体束缚、实现精神飞升的愿望。

珍贵的红天鹅则现身于出土简牍里。清华大学珍藏的战国竹简曾经泥土里埋藏千年，其中有一则“赤鹄之集汤之屋”，里面记载在商汤王宫的屋顶上，曾经有一群红色天鹅聚集，此事作为祥瑞的象征被记录下来。然而红天鹅只是惊鸿一瞥，从此，无论是在故纸堆里，抑或现实世界中，均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已经成为一个谜。

那么黑天鹅呢？它们的翩翩身影似乎也很少出现在史书里。貌似只有宋人的一本《古琴疏》，记载晋人戴逵有把古琴，取名“黑鹄”。这位戴逵就是《世说新语》里的那位戴先生。雪夜，名士王徽之半夜起床，诗兴大发，想起戴先生，于是马上坐船去看他。天快亮了才到达，却并未下船，反而调头回去，“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名士之交，如此性灵。这位戴先生恐怕亦非凡俗之士，才会给自己的琴取个这样的怪名。

那时，他也不会想到，千年之后还真有黑天鹅漂洋过海而来。它们的祖籍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文明的交融、人类的交流，吸引远方的黑天鹅来到与颐和园一墙之隔的湖面，和白天鹅比翼齐飞、和谐共处。

走过那片湖水，瞥见天鹅，偶发思古之幽情。天鹅们在自然的世界里，浑然不觉，任意东西，快乐地生活着。



校园新貌

中央党校南院小湖中，一对黑天鹅在悠闲戏水。

张晓光/摄

（上接1版）现代化信息通道建设，重点推动福建与东盟国家的信息走廊建设，完善信息网络合作与信息传输机制，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信息互联互通；口岸通关体系建设，关键是促进港口通关有效整合，探索推进与东盟国家、台港澳地区口岸通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升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便利化程度。

聚焦产能合作，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层次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开展国际产业合作。当前，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工业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愿望比较迫切，与福建在产业上的互补性比较强，经贸合作的基础条件比较好。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与福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

结合，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现产业联动、经济融合、发展平衡。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鼓励和引导我省具有优势的机械装备、建筑建材、能源矿产、纺织服装等龙头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牵头建设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和制造业基地，向外输出先进装备、技术标准、管理经验、营销模式，实现在更大范围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另一方面，要更加有效地“引进来”，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及全球领先企业到闽战略投资，引导外资重点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等领域，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在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数控机床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产业向中高端发展。福建海域面积比陆域面积还大，海洋产业、海洋环境、海洋文化等都可以成为海丝

核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我们要积极推进“智慧海洋”建设，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远洋渔业产业园区、海外综合开发基地，同时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海洋研究开发、海洋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安全救助等领域的合作。

大胆先行先试，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搞好“一带一路”建设要向创新要动力。除海丝核心区外，近年来中央还相继批准设立了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新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其共同要求都是在体制机制上作新的探索。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福建自贸区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希望我们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加快改革系统集成，力争取得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特别是进一步发挥沿海近台优势，在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个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放大大自贸区溢出效应，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境外投资管理流程、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同时，要充分发挥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试验区建设，推动设立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

业合作基金。完善区域合作交流机制，建立福建与东盟国家的常态交流机制，加大友好城市缔结力度，吸引台资企业借道福建拓展东盟出口市场，促进福建、东盟、台湾三地间的物资和资金流动。

着眼民心相通，促进人文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福建拥有海外乡亲1580多万，其中约1200万在东南亚。在深化与东南亚等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中，福建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和人文优势。我们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精耕细作人文领域，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文化认同和民心相通。充分发挥海外侨胞的桥梁作用，重

点加强与闽籍华人社团和重点人士的联系，引导海外闽籍乡亲积极参与当地政治和社会事务，深化青年、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友好交流。深化教育领域合作，加快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华侨创办高校的海外“反哺”办学进程，积极支持闽籍华人华侨聚居地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华文学校建设，吸引更多海外特别是东盟国家学生来闽接受教育和开展研学旅行。丰富文化交流活动，加大海丝题材文化艺术精品创作和海外推广力度，做好“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工作，继续办好海丝之路国际电影节、艺术节、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加强人才双向交流，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鼓励我省专业人才培养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重大对外投资项目建设。